



中华文学

通史

第七卷·近现代文学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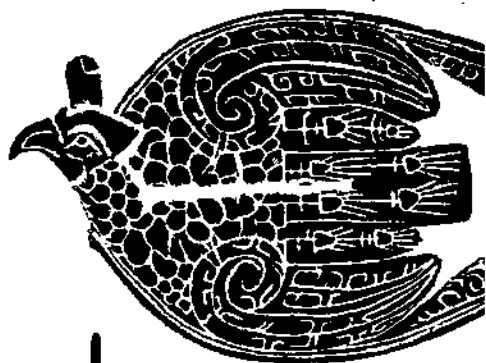
华艺出版社



张炯 邓绍基 樊骏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





中华文学

通史

093667

张炯
邓绍基
樊骏
主编

华艺出版社

现代文学编
现代文学(下)

《中华文学通史》总编辑委员会

主 编	张 炯	邓绍基	樊 骏
编 委	王 庵	扎拉嘎 (蒙古族)	
	仁钦·道尔吉 (蒙古族)	邓敏文 (侗族)	
	石昌渝	刘世德	刘扬忠 刘魁立
	祁连休	严家炎	吴子敏 张大明
	连燕堂	陈晓明	杨匡汉 郎 樱
	降边嘉措 (藏族)	曹道衡	董乃斌
	蒋守谦	曾镇南	(以姓氏笔画为序)
秘书长	董乃斌	郎 樱	
副秘书长	陶国斌	严 正	

近现代文学编编辑委员会

主编 樊 骏

编委 万平近 王 飏 扎拉嘎 (蒙古族)

邓敏文 (侗族) 关纪新 (满族)

关爱和 刘扬体 吴子敏 吴福辉

连燕堂 张大明 袁 进 黄淳浩

梁淑安 温儒敏

目 录

现代文学（下）

第十五章	沈从文与北平作家群·····	(3)
第一节	苗族作家沈从文·····	(3)
第二节	废名、萧乾、芦焚等人的小说·····	(16)
第三节	《骆驼草》的散文小品·····	(29)
第四节	“汉园”三诗人（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及其他·····	(40)
第五节	朱光潜、李健吾的文学理论批评·····	(49)
第十六章	五光十色的上海文坛·····	(59)
第一节	戴望舒等人的现代派诗歌·····	(59)
第二节	唯美颓废倾向的小说·····	(65)
第三节	“新感觉派”小说·····	(75)
第十七章	从“文章下乡，文章入伍”到文艺的 工农兵方向·····	(85)
第一节	国统区文学、根据地—解放区文学和沦陷区文学并存的格局·····	(85)
第二节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96)
第三节	周扬、胡风的文学理论批评·····	(102)

第十八章	反侵略反压迫旗帜下的国统区文学（上）	（115）
第一节	报告文学与杂文、散文	（115）
第二节	抗日题材的小说与路翎等作家的作品	（128）
第三节	沙汀与其他作家的小说创作	（144）
第十九章	反侵略反压迫旗帜下的国统区文学（下）	（164）
第一节	夏衍及其他剧作家	（164）
第二节	阳翰笙等人的历史剧	（181）
第三节	进步电影文学创作	（193）
第二十章	艾青与其他诗人	（213）
第一节	艾青	（213）
第二节	田间和“七月派”诗人	（230）
第三节	力扬、光未然、袁水拍	（248）
第四节	冯至	（266）
第五节	穆旦等的《中国新诗》群体	（279）
第六节	四十年代诸家诗论	（296）
第二十一章	赵树理与根据地—解放区的小说创作	（308）
第一节	赵树理	（308）
第二节	《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及其它中篇小说	（319）
第三节	孙犁	（338）
第四节	根据地—解放区的短篇小说	（348）
第二十二章	表现新的群众时代的剧作、诗歌及其它	（357）
第一节	《白毛女》、《血泪仇》等剧作	（357）
第二节	《王贵与李香香》、《漳河水》及其它诗作	（372）
第三节	报告文学与其它创作	（390）
第二十三章	沦陷区文学及其它	（397）
第一节	台湾文学	（398）
第二节	东北地区的文学	（413）
第三节	华北地区的文学	（420）

第四节	“孤岛”文学及其它·····	(428)
第五节	张爱玲与其他作家·····	(438)
第二十四章	北方少数民族的现代文学·····	(446)
第一节	满族文学·····	(447)
第二节	朝鲜族文学·····	(454)
第三节	蒙古族文学·····	(459)
第四节	回族文学·····	(463)
第五节	维吾尔族文学·····	(469)
第六节	哈萨克族文学和锡伯族文学·····	(475)
第七节	藏族文学·····	(480)
第二十五章	南方少数民族的现代文学·····	(492)
第一节	社会概况与文学综述·····	(492)
第二节	作家文学·····	(494)
第三节	民间文学·····	(504)
第二十六章	儿童文学·····	(512)
第一节	“五四”以前中国儿童文学的概貌·····	(512)
第二节	“五四”与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转型·····	(518)
第三节	二十年代文学研究会的“儿童文学运动”·····	(533)
第四节	三十年代儿童文学的左翼潮汐与“革命 范式”·····	(548)
第五节	战争年代儿童文学的时代规范与救亡主题·····	(563)
第二十七章	民间文学及其整理研究工作·····	(587)
第一节	二三十年代的歌谣运动·····	(588)
第二节	各民族民间文学作品的采集与研究·····	(601)
第三节	现代出版物与民间文学·····	(618)
本卷后记	·····	(634)

现代文学 (下)

2020

第十五章 沈从文与北平作家群

第一节 苗族作家沈从文

随着“五四”的退潮，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更多成员聚集于上海。像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初期新文学的重要社团，都以上海为主要活动基地。鲁迅于一九二六年八月离开北京南下，在厦门、广州停留了一年，自一九二七年十月起定居上海。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旗帜的革命文学运动，也是首先在上海蓬勃兴起的。这个地处东南沿海、更具现代气息的大都市，也就逐渐取代北平，成为新文学更有吸引力也更具辐射性的中心。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作为新文化、新文学发祥地的北京，就此丧失了自己的活力。语丝社、浅草—沉钟社、莽原社、未名社等，都成立于此。前章所述的曹禺，也是从南开、清华开始创作生涯的；还由此揭开现代中国话剧艺术新的一页。其内在的动力，在于当年的一些倡导者虽然部分地失去了原先的豪情锐气，都仍在这里继续作着创新发展的努力；好几座堪称全国一流的高等学府，不断培养出众多的文学新人；在胡运、周作人的周围，又集合着一批兴趣相投的作家，所以，北平依然是新文学的一个中心，并且在二三十年代，逐步形成后来被称为“京派”的、虽然没有固定严密的组织、却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有鲜明特色的文学流派。沈从文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员。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湘西凤凰人。他出身行伍家庭,祖父少年时卖马草为生,因镇压太平军有功官至贵州提督,后厌倦官场斗争辞官归隐。父亲参与辛亥革命起义军攻打凤凰城,后去北京密谋刺杀袁世凯,事迹败露后逃到关外。沈从文的祖母是苗族,母亲为土家族。谈及不同民族血统的影响时,施蛰存说他存在“苗汉混血青年的某种潜在意识的偶然奔放”^①。他自己则认为“我的气度得于父亲影响的较少,得于妈妈似较多”,父亲的“硕大,结实,豪放,爽直”的军人本色,也“使我在任何困难情形中总不气馁”^②。湘西的山水人情瑰丽而又浪漫。这里地属楚文化,中原文化鞭长难及。由于汉苗等民族杂居,苗民信奉多神,热情奔放,富于直觉审美力,湘西成了不同生活方式(从经济到文化)的会合点。俗称的所谓边城边民,不是国家的疆域概念,而是文化概念,属于华夏制夷欺蛮的民族隔离概念。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成长的沈从文,幼年贪玩逃学,对人生万象充满了好奇与求知。他觉得“我的智慧应当从直接生活上吸收消化,却不须从一本好书一句好话上学来”^③。他“为现象所倾心”,陶醉于自然景色和人生世态的种种世相,脱去了世家子弟常有的嗜书本、近君子、远庖厨的习性。由于祖母是苗人,“照当地习惯,和苗族所生儿女无社会地位,不能参预文武科举,因此这个苗族女人被远远嫁去,乡下虽埋了个坟,却是假的”^④。辛亥革命时,年约九岁的沈从文听说衙门从城边抬回四百多个人头和一大串人耳朵,又在天王庙大殿里看到犯人用掷竹筴的办法决定自己的生死。过了十四岁,他到土著军队里当兵,在沅水一带闯荡了五年,看到过诸如兵士押解着十二三岁的孩子,孩子挑着自己父亲或者叔伯的人头,后面跟着一两个双手反缚的人,一

① 《滇云滴语从文》，见《长河不尽流——怀念沈从文先生》，湖南文艺出版社。

② 《从文自传》。

③ 《从文自传》。

④ 《从文自传》。

担衣箱，一匹耕牛的惨状。他当过书记，接触了许多古籍和文物。后来，又在一家报馆读到《新潮》、《改造》、《创造周刊》和一些新书，受到“五四”新文化的启迪。他反省“我虽时时刻刻为人生现象自然现象所神往倾心，却不知道为新的人生智慧光辉而倾心”^①，他感到有一种新的、更理想的、通过“文学重造”达到“社会重造”的工作等着他去作。于是二十岁时孤身一人来到了北京。

沈从文初来北京，生活清苦。他自修成才，转益多师。早年创作中，不忘情于湘西乡下，又瞩目于城市人生。他笔下的题材和人物多种多样，体裁样式又多方尝试，包括散文、戏剧、诗歌和长短篇小说。《阿丽思中国游记》（1928）以童话形式指斥了包括崇洋媚外在内的诸多丑态恶行；《龙朱》（1929）是取材于民间传说的一组短篇小说；《月下小景》（1933）改写了一组佛经故事，作者取名《新十日谈》，意在列入大众文学，供读者把玩。笔下的人物遍及社会多个层面，除船夫、水手、妓女、军人、老板、杂役等湘西人物是他熟悉的，城市的绅士、太太、学生、文人、妓女、演员也都纳入自己的视野。总的质量上，写城市生活的作品不如湘西题材的，但也留下了一些独到的观察与生动的剪辑。《十四夜间》（1927）、《第一次做男人的那个人》（1928）篇幅很短，写沉沦的嫖者和娼者的邂逅，写邂逅时的忏悔，从人性丑中挖掘出了人性美。一九二九年发表的《会明》与《灯》，前一篇写军队火夫，后一篇写家庭厨子，性格憨厚善良，却又各具特色。

沈从文进城后，直接接触到了新文化和文化人。他以思想启蒙和文学革命作为自己的大目标，在结交朋友上不以政治划线，常以性情投合从善如流。在文化思想上，不拘泥某个主义和流派，而是杂取众家，包括他突出地提到的从契诃夫、屠格涅夫、莫泊桑以及鲁迅、郁达夫身上学到不少东西。他一九二五年就提到“潜

^① 《从文自传》。

意识”，从林宰平学习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从聂仁德姨父学到达尔文的进化论、地方自治和宇宙论，向丁西林、许地山学民俗学、人类学、心理学，从周作人、张东荪那里接受了性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的观点，还吸收了西方变态心理学的某些主张。《如蕤》（1933）写女主人公的爱情追求以及骤然辞别，《都市一妇人》（1932）写一位女性被玩弄以及玩弄人、终于抓到一个心爱的丈夫又亲自弄瞎了他的眼睛以求不再被遗弃，就明显看出变态心理学的影响。

沈从文缺乏政治理论思维应有的某些坚持与机敏；与此同时，少数民族的血液所形成的生理素质和心理素质，个人亲历的人生苦难，使他的艺术悟性和直觉思维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在写作追求与创作方法上，有别于新文学（特别是左翼文学）多数作家奉为主流传统的“必然（本质）+理性”的人学模式，坚持自己的“偶然+情感”的创作追求，营造着一块引人注目、不可或缺的新鲜园地。

沈从文晚年对自己的文学创作作总体回顾时说，来城市五六十年来，仍然“苦苦怀念我家乡那条沅水和水边的人们，我感情同他们不可分。虽然也写都市生活，写城市各阶层人，但对我自己的作品，我比较喜爱的还是那些描写我家乡水边人的哀乐故事”。^①在早年的多方探求和尝试之后，进入三十年代，他的主要精力就集中湘西世界了。《柏子》（1928）是他的第一篇成名短篇小说，是确立他的独特乐章的一个序曲。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三十年代编译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活的中国》，收进了这篇作品。鲁迅同斯诺的谈话中，列举了包括沈从文在内的中国七八个最好的小说家。作者以不同于内地作家的传统伦理观念和审美眼光，把笔触伸向了湘西河流的吊脚楼露水夫妻生活。船夫同吊

^① 《自我评述》，见《沈从文别集·凤凰集》第7、8页，岳麓书社。

脚楼妇人的炽热情欲写得活灵活现。船只一靠岸，桅子上的歌声便起，妇人把临河的窗子打开，一会儿，这船上唱歌人就跃上吊脚楼：“门开了，一只泥腿在门里，一只泥腿在门外，身子便为两条臂缠紧了。在那新刮过的日炎雨淋粗糙的脸上，就贴紧了一个宽宽的温暖的脸子。”作品不是从旧中国意识形态的上层规范俯瞰这吊脚楼夜生活，而是从里面凸现沿河下层人民的命运和悲欢。人物对话充满了村野与泼辣，女人责怪这“悖时的”来得太晚，男人要她赌咒真那么“规矩”。末后，是互表“忠贞”，是女人把柏子随身带的香粉、雪花膏搜光，柏子把积蓄一两个月的铜钱倒光。然后，柏子点燃废缆子回到船上，等待再过半月一月的下次欢聚。多么热情而又令人悲悯的多间生灵！

比较起来，《丈夫》（1930）有更为深广的开掘。离开了石磨和小牛也离开了丈夫的女人，是为了接济家庭到妓船卖身的。丈夫来船上探亲，碰上妻子接客，丈夫只能从船板缝里观察动静，妻子也只能在半夜里抽空爬过后舱，给丈夫塞一片冰糖。作品提到这夫妻在农村受到村长和乡绅的盘剥，写到水上水保、副爷、巡官的胡作非为，他们都是可以随意霸占妻子而丈夫只得躲进后舱的人物。在妻子身边，作品安置了年长的掌班大娘和年幼的多多，她们是妻子的未来与过去的影子。最后写到他们第二天一早回乡。但谁能担保妻子不再回到船上呢？

作者最早的短篇小说，更像散文，结构上散漫无序，到了《柏子》、《丈夫》已达到结构上的严整了。在表现风格上，有人称作者“使悲啸的大号化为一支悠远的洞箫”（何立伟），日本的冈崎俊夫谈到《丈夫》时说：“要是一位左翼作家的话，一定以咏叹的怒吼来描写这场悲惨状况，这位作家却用冷静和细致的笔来描写，而且在深处漂浮着不可测度的悲痛。”^① 冈本隆三（日本）赞

^① 见《沈从文研究》第一辑第190页，湖南大学出版社。

扬沈从文远远脱离道德君子的感情，能在不符合伦理的东西里发现美好的感性。作品把挤压在权势、金钱与淫欲下的穷苦夫妻的恩爱与痛苦，不露声色地表现出来。黄永玉说：“他的一篇小说《丈夫》，我的一位从事文学几十年的，和从文表叔没有见过面的前辈，十多年前读到之后，深受感动，他说：‘……这篇小说真像普希金说过的，伟大的俄罗斯的悲哀。’”^①

在湘西题材的短篇小说中，作者有自己的独特的设计与追求，以便多侧面展示湘西世界的底蕴。《旅店》（1929）是借旅店这个特定的场景以及女主人公性意识的勃发，写出她、驼子助理与大鼻子客人为偶然性的生死命运所播弄，在人生如梦的世界里各自又受到制约的漂泊感和难言的苦痛。《菜园》（1930）写玉太太的儿子和媳妇作为共产党“陈尸教场”，全篇贯穿悲剧调子，从人物爱穿的白麻布白绸子衣服到白菜、冬雪、白菊、白色母鸡等场景道具，渲染一派凄清和悲悼色调。《黔小景》（1931）现出作者的绘画才能，写客栈烤火，写旅途惨状，人与影的配搭，光与色的运用，是一幅惨不忍睹的贵州难民图。一九三七年写的《贵生》，阶级斗争色彩较浓，这位厚道助人的青年农民在情人被五爷霸占后，奋起烧掉房子，作者爱憎鲜明，至少在客观上肯定了特殊条件下暴力的合理性。

《八骏图》（1935）则是城市题材的代表作。沈从文写城里人，也明显烙印着他这个“乡下人”艺术家的眼光与情感。小说写作家达士先生到青岛休假和讲课，发现同来的七位专家“心灵皆不健全”。达士说他们的性意识同虚饰的外表发生冲突，通篇又是达士的一幅自嘲图。达士自认是医治者，是主人，结果反倒需要医治，成了奴隶。小说以达士到青岛始，将离终，以写信始，拍电报终，通篇贯穿那个有点神秘感的女人的黄色身影，采用颜色学

^① 《太阳下的风景——沈从文与我》，见《花城》1980年第五期。

上富于夺目性的“黄色点子”，让她晃动其间，布局上错落有致。“八骏”之说，就是“乡下人”的反讽。假道学的虚伪，反自然的矫情，粗鲁的纵情主义，都在揶揄之列。作者在《〈八骏图〉“题记”》提到读书人“懒惰，拘谨，小气”、“营养不足，睡眠不足，生殖力不足”，提出“憎恶这种近于被阉割的寺宦观念，应当是每个有血性的青年人的感觉”；甚至说到这种寺宦观念“反映社会与民族的堕落”。对于这篇作品，不能停留于对人物的性意识潜意识等“无常的人性”的认识和分析，如果只讲“无常的人性，无常的爱，无常的欲，这正是《八骏图》所写的主题”（司马长风），这就太拘泥于事象的表面，倒是金介甫讲的“从病理学角度剖析作家的使命，对中国现代知识阶级尽情嘲弄”^①，把握了这篇作品的主旨。

一九三四年初，沈从文回到阔别十余年的湘西故里。他从沿途给妻子张兆和的信件里，整理集结成了散文系列《湘行散记》。它同三年前的《从文自传》有好多印象叠合的地方，前为现实见闻，后为往事追忆。三年后，抗战爆发，他第二次回故乡，又写了《湘西》。加上这之前写的《记胡也频》、《记丁玲》，见出了沈从文在散文、纪实文学方面的卓著成绩。总根于他这个“少见的热爱家乡，热爱土地的人”（汪曾祺）的爱，他的笔下蘸满了感情的浓汁，带着一种“乡土性”的抒情，在对读者喃喃诉说式的叙述风格中，从“淡淡的孤独悲哀”中感受到他对家乡人的深深悲悯。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中提到因为读了《湘行散记》，把沈从文列入优秀散文作家。《从文自传》出版后，周作人在一九三五年《论语》杂志举办的“我最爱读的三本书”里，把它列为第一本。沈从文在这些散文系列长卷里，把历史回顾、现实观察同人世变故加以综合处理，由浓郁得化解不开的感情所绾住，摆脱了不少散文家常有的市井气、闺秀气、学院气或闲适气。

① 金介甫：《沈从文传》第205页，时事出版社。

《从文自传》写家庭情况极为概略，写自身经历中的难忘人物涉笔甚多。作者借此叙述辛亥革命前后的生灵涂炭，幼年的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社会风情和自然景观引发的深长忧思，读者从中可以看出一个“乡下人”艺术家的性格成长。比较起来，《湘西》显示出同《从文自传》、《湘行散文》相对立又相补充的写作方式。后者由特写走向全景，前者由全景导向特写。作者在抗战中为了廓清湘西“匪区”的谬传，在《湘西》里从社会调查等理性文字入笔，配合以故事传说和人物速写。《常德船》可作常德船只博物志，《沅陵的人》可列入女权主义资料，《辰县的煤》、《沅水上游几个县分》举出了阶级压迫的事实，加上赶尸的“辰州符”的澄清，把地方志、调查报告、民间传说综合到散文形式里去了。

《湘行散记》写他第一次回乡，可以和《从文自传》相印证，可以“温习那个业已消逝的童年梦境”，对人生和历史的思索就构成这个散记的突出主题。作者看到船上站着鱼鹰，石滩上走着拉纤人，日复一日，代复一代，于是感慨着“历史对于他们俨然毫无意义，然而提到他们这点千年不变无可记载的历史，却使人引起无言的哀戚”（《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日》）。最简单、最常见的是单个人的人生循环、人人相因。《桃源与沅州》写到一只桃源小划子的人员格局：一个舵手，一个拦头工人，听使唤打杂的小水手。这种小水手“除了学习看水，看风，记石头，使用篙桨以外，也学习挨打挨骂。尽各种古怪稀奇字眼儿成天在耳边反复响着，好好的保留在记忆里，将来长大时再用它来辱骂旁人”。他们是明天的拦头工人或舵手，再重复另一种人的命运。吊脚楼里妓女的命运就更惨。她们年轻时同水手大概有过真情的恩爱与相许，到了年老多病，只能胡乱吃药打针，“直到病了，毫无希望可言了，就叫毛伙用门板抬到那类住在空船中孤身过日子的老妇人身边去，尽她咽最后那一口气。”这类卑微的人生循环，只能是维护着一个蠕动着的社会继续蠕动。《老伴》记述作者三次路过泸溪县城城